

孙楷第传略

杨 镰



孙楷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中国小说史研究家。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在长达一个花甲的岁月中，孙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他的许多创见为人们所接受，他的丰硕成果拓展了人们的视野。

—

孙楷第，字子书，河北省沧县王寺镇人，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生于1898年1月，卒于1986年6月23日。享年八十八岁。

孙楷第早年在家乡王寺镇读小学。时逢清末社会动乱，小学结业较迟。民国初年，他到县城的沧县中学读书。

1922年，孙楷第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兼《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

孙楷第在校学习期间，受到老师杨树达的赏识。杨树达先生在讲授《韩非子》时，曾数次引述孙楷第所写的札记《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补正》里的话，并亲笔在孙楷第另一篇文章上加批道：“作得好。可喜也！”杨树达先生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孙楷第有很深的影响。

1931年，孙楷第到北平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工作，其后又兼任北师大等几所高等院校中文系的讲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孙楷第便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1931年9月，北平图书馆委派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9月19日抵达东京。刚到住地，就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悲愤填膺，欲归复止”。他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查、著录了日本东京公私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然后便取道大连返回北京。此行的具体收获是，写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及《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一卷。两书曾一再出版，成为治小说史者重要参考书。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南迁。但北平图书馆工作尚未停顿，孙楷第仍到图书馆任职。

抗战期间，北平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下，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都拒绝与日伪当局合作。孙楷第的戏曲、小说研究，在日本汉学界颇有影响，但是为避免为日伪宣传机构所利用，他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就中止了日本人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小说戏曲类提要的撰写。日本盐谷温教授到北京，曾派学生执其亲笔信邀请孙楷第到北海漪澜堂赴宴，孙楷第以“有病不能与会”辞谢了。

1941年11月，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日、美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宪兵强行接管了北平图书馆。为表示抗议，孙楷第中断了研究工作，离开北平图书馆，弃职家居，有一个时期要靠卖书或友人接济度日。这一义愤之举，徐森玉先生以“二十四郡，唯颜鲁公”加以称许，借用唐代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郡尽为安禄山叛

军所下，唯颜真卿独守平原的典故，表彰孙楷第敢于面对强暴而不气馁。可以看出孙楷第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

1942年，经陈垣校长介绍，孙楷第到私立辅仁大学作讲师，陈垣先生是孙楷第十分尊重的师长，他们在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方面都有许多交往。

抗日战争胜利，由北京内迁的各大学纷纷复员返京。抗战之前，胡适就曾介绍孙楷第到北京大学任教（后因“七·七”事变未能到职），北京大学从云南迁回后，孙楷第便到北大国文系任教授。1948年，转入燕京大学，仍任国文系教授。

解放战争期间，他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多次参加进步教授的签名活动。

北京于1949年春天和平解放。1952年，国家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195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文学研究所，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孙楷第调入文学所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直到病逝。

解放后的十七年中，孙楷第不但把旧著一一修订再版，还继续从事《小说旁证》的撰写及《元曲家考略》的增补。1962年，他应中华书局之约，将自己所写的单篇论文逐篇校订，汇集成《沧州集》（上下两册），共收文、史等方面的论文四十五篇。

作为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孙楷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其中尤其使人痛心的，是他在数十年间节衣缩食搜集的万册藏书全部丧失。“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每当重新拿起笔，准备著述时，就不免要望着空荡荡的四壁伤心叹息。

尽管如此，他仍然制定了写作计划，准备把未刊布的旧作一部部整理出来，并有撰写新作的设想。他不顾病弱之躯，非常关心中青年学者的进步。许多同志都曾受到孙先生的教诲。

二

孙楷第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他的论文集《沧州后集》。当年编辑《沧州集》时，有一些文章因种种原因未能编入，所以难以反映出他的全部研究成果。1982年，由黄克同志协助编辑了《沧州后集》。至此，除未刊手稿之外，孙先生所有的著作都有了由作者审校过的新版本。

1986年初，孙先生应笔者之请，曾列举出自己单篇论文的代表作，即：小说《水浒传旧本考》、《三言二拍源流考》、《李笠翁与十二楼》、《关于儿女英雄传》；戏曲《近代戏曲原出傀儡戏影戏考》、《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变文《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历史人物事迹《刘裕与士大夫》、《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唐宗室与李白》。

由此可见，孙楷第先生是以小说、戏曲史为主要研究对象，还涉及了变文、楚辞以及历史人物和诸子等方面。

从1930年开始，孙楷第大量阅读北平公私所藏古典小说。当时，北平图书馆、孔德学校、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收藏有不少小说，马隅卿私人所集亦富。孙先生采取边读边记边考辨的方法，从版本目录学入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五六十年间，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目录学是由孙先生草创的。现只扼要介绍其一端。

元明之际产生的两部伟大的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孙先生研究的重点对象，他不但做了版本的比较与研究，还十分注意成书过程。他的《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旧本考》、《水浒传人物考》都是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旧作，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所作的序言《李笠翁与十二楼》，是孙先生的一篇力作。此文长达四万字，以丰富的资料评

介了清初颇负盛名的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生平与写作生涯。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二楼》点校本时，书中还收入了孙先生这篇旧作。李渔不但写有《十二楼》等通俗小说，《风筝误》等传奇，还作有流传颇广的戏曲理论著作《闲情偶寄》，鉴定、刊印了《芥子园画传》，在文学史上是十分活跃的人物，应该给予重视，但在过去正统文人心目中，他的地位并不高，也从未有过较系统的评论与介绍。孙先生写《李笠翁与十二楼》就是想改变这种情况，从评介他的学问与作人态度入手，确认他在清初文坛上的地位。这篇论文可以看成一部小型的李渔评传，是李渔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如《与胡适之论醒世姻缘书》、《三言二拍源流考》、《关于儿女英雄传》等文章，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戏曲史的研究也是孙先生着力甚多、收获颇大的一个课题。三、四十年代，他就以《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傀儡戏考原》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推重。五十年代，捷克汉学家还曾准备把后一种译成外文。

《元曲家考略》是孙先生研究元曲史的重要成果。元曲家大多社会地位低下，事迹隐而不显，从读书知人这一角度来说，使元曲的研究颇受限制。有感于此，孙先生读了很多元人著述，搜集了有关资料，经过排比、筛选、考辨，终于作成一部元曲家列传。这是一部在学术界影响颇大的专著。总的特点是，所使用资料覆盖面比较大，而且运用得准确可靠。全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稿（实即四卷），所考元曲家共85人。例如元曲家薛超吾，字昂夫，号九皋，为回鹘人。汉姓马，故又称马昂夫或马九皋。由于他的诗集早已散佚，又没有留下碑传文字，故元明之际就已出现把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当作不同的曲家之误，比如那部影响很大的《太和正音谱》就把他分成三个曲家来分别评论，竟说：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薛昂夫之词如雪窗翠竹；马昂夫之

词如秋兰独茂。后来一些著作又误马昂夫为司马昂夫。这一问题始终未能澄清。孙楷第先生首次将这个问题考证明白，并列出薛昂夫的仕履。这篇“考略”在使用资料上颇见功力，所引元人著述都经过辨析与排比，为孙先生的结论打下了坚实基础。此论一出，再未见将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分三人而论的观点。

另外，应该提一下他的论文《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日本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曾重刊了国内久已不见传本的元杂剧《西游记》，并定其为元人吴昌龄所作。孙先生撰文考证出此剧为杨景贤曲，并非吴昌龄曲，观点新颖，论证严密，有说服力，足以解中外学者之感。

除小说史、戏曲史的研究，在其他文史研究领域，孙先生也有建树。他于1933年撰写了《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一文，以后又写有《读变文杂识》，专门探讨了变文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孙先生的变文研究受到敦煌学界的重视与肯定。胡适读了孙先生的文章，曾主动邀请他到北平大学开设变文课。著名敦煌学家王有三（重民）先生曾著文指出：“变文释义”“以孙楷第的变文之解为最好。”并肯定了孙先生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说它“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见其遗稿《敦煌变文研究》，刊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孙先生还从诗歌发展史角度研究过楚辞及汉魏六朝乐府歌辞，并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九歌》、《九辩》均为汉代作品，在《九歌为汉歌辞考》、《读楚辞九辩》等论文中，他作了较完整的论证。在《绝句是怎样起来的》一文中，孙先生对关于绝句来源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绝句”应源于乐府的“摘遍”（即演唱乐府歌辞时，不唱完全曲只摘出其中的“一解”即席演唱）。对这些见解虽还有不同意见，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此外，孙楷第先生还曾涉足于历史与诸子研究领域，写出一些有分量、有自己见解的文章，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三

与当代许多著名学者一样，孙楷第先生是“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于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当他最初的一些成果自三十年代初刊登出来之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瞩目。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问世时，郑振铎先生欣然为之作序。此书出版二十年后，郑振铎先生还称许道：“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二十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激的。”（《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鲁迅与胡适是中国现代研究古典小说最早、最有成效的学者。胡适十分重视孙先生的研究成果，他称赞孙先生的小说目录学在小说史研究上“绝太重要”，“没有这些古本小说的详细记载，我们决无从了解一部小说的历史。”胡适认为，孙先生打下了小说研究的“新基础”。对于一个后学，这是很高的评价。胡适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所写序文的开篇。就毫无保留地介绍道：“沧县孙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

纵观孙先生长达六十年的辛勤耕耘，这些推许并非过誉。孙先生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以小说史、戏曲史为例，都是循着从版本目录学入手的可靠途径，把研究工作建立在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孙楷第先生早年长于诸子之学，在北平高等师范就读时，在杨树达先生指教下，认真披读了清代乾嘉学派的主要著作，并且接触了汉学的思维方法与考据方法。大学毕业后，无论留校任教还是到北平图书馆工作，他仍然经常向老师杨树达先生请教，在去日本访书之前，据孙先生自记，就“先谋之吾师杨遇夫先生，于旅行及观书等事，多所指导。”（《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缘起)从孙先生早期论文中,不难看出杨树达先生的影响。孙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时间较长,一些主要论文就写于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方向,也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他接触了大量典籍,把着眼点放到版本、目录学上。他参考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方法,开始了从事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胡适曾这样评述孙先生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他的成就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作基础而已。”胡适进而又说:“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本节所引胡适语,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中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

对于小说、戏曲的版本目录,孙楷第先生是下了大工夫的。他的三种小说书目著录了八百余种古典小说(包括同书的不同版本);他并作有《读曲札记》(未刊),涉及上千种古典戏曲,以致被称为“沙里淘金”(郑振铎语)。

论作学问,孙先生是相当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凡立论,总有充分的资料为依据。但他又从未不加分析、鉴别就盲目引用。比如有人曾举出元人文集中的一篇《张可久去思碑》,认为是关于元曲大家张小山的新资料。笔者曾就此当面请教孙先生。孙先生说在撰写《元曲家考略》时,他注意到过这篇“去思碑”。我问:

“那您为什么不加引证呢?”孙先生指出:元人立去思碑是有品级限制的,现有资料证明,张小山最终只是沉沦下僚的小吏,根本不够立去思碑的资格,那只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人而已。经反复披读这篇去思碑,我们不能不同意孙先生的见解。在孙先生的文章中,凡引资料必是经过分析、比较和鉴别的,而他的结论,都是通过对资料的分析、比较和鉴别,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读他的文章,总受其严谨、求实的学风影响,而没有先入为主的随意性。

四

在这里，我们向学术界介绍一下孙楷第先生的遗著及其整理情况，因为它们虽然未能在孙先生生前问世，但也是其学术成果的一部分。

《小说旁证》是孙先生十分重视、写作时间相当长的一本书，目前虽已完稿，但仍未正式出版。自三十年代以来，在北京图书馆馆刊、《文学评论》、《文献》等期刊发表过数十则。全书共二百余篇，凡四十万字。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过，读书要知道底本。孙先生深受其启发。从1929年刚留校任教起，就研读四部群书，从子部、集部直到方志、史籍，每读到白话小说的本事或有关资料，便不惮其烦地一一抄录下来，久而久之，汇集成册。他又就这些原始资料进行了筛选、排比，从中摘出有一定故事性的内容，厘为七卷，题作《小说旁证》，专门考索白话短篇小说（话本、拟话本）的来源与演变。在几十年的读书生活中，每有所得便随时增订，使其日益完善。这是一部对小说史研究颇有用途的著作，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现仅举一例，对其内容略作说明：《金海陵纵欲身亡》是有名的宋元话本，冯梦龙曾将其收入《醒世恒言》。这部话本专门披露金主完颜亮的淫暴无耻。孙先生依据元好问《遗山先生集》、苏天爵《滋溪文稿》、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证明这篇小说所记之事全属“子虚乌有”，于历史的真实面貌相距甚远，那些说法实是完颜亮的政敌完颜雍（金世宗）授意编造出来诋毁对手的。孙先生一边引证资料，一边作比较分析，直至得出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为止。这是传统考据学在小说领域里的具体运用的范例。

已正式列入出版计划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也是孙先生倾注了许多心血的遗著。

本世纪三十年代，由日本的“东方文化协会”出面，提出编撰一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的计划，并约请当时国内知名学者如柯劭忞、赵万里等人撰写“总目提要”，孙楷第应邀负责撰写小说戏曲类。从1933年开始，到“七·七”事变，四、五年间孙先生一共为四百多部古典小说戏曲写了提要。在此过程中，孙先生还附带为几十种方志撰写了提要。

“总目提要”写成一部分，便由东方文化协会打印成册，孙先生所撰共打印出二十五册。但《续修四库全书》并未编成，

“总目提要”一直以打印稿形式保存至今。前些年台湾省曾刊印了其中一部分。“总目提要”由于是多人撰写的大部头著作，内容庞杂，质量也不尽一致。一位学者这样评价《续修四库全书》的“总目提要”，“这部书是有学术价值的，尤以孙楷第撰写的那部分有创见，有分量，今天读之仍然没有过时之感。”

打倒“四人帮”以后，孙先生所撰提要曾在山西的《艺文志》丛刊连续发表过若干则，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自1984年以来，孙先生不顾年老体弱，开始为这一旧作作校订。他拟将原稿分为六卷（小说、戏曲各三卷），并题名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題》。这部为学术界期待已久的著作在近年内即可问世。

孙先生的力作《元曲家考略》也可以说是一部未完稿。其中甲、乙两稿写定于四十年代末，1953年由上海的上杂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五、六十年代，孙先生又续写了丙稿、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甲、乙、丙、丁四稿合为一书，于1981年出了新一版。孙先生原计划共写五篇，其中戊稿未能在生前整理完成。戊稿共收元曲家18人的考略，仅其中的刘时中、冯海粟二人的考略发表在1983年第4期《文学遗产》上，尚有16位元曲家的考略待整理。相信《元曲家考略》的全帙不久将会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除以上三部基本完稿的著作，孙先生还留有大量遗稿，其中有些是读书札记或资料长编，但也有已基本成书的手稿，比如

《〈录鬼簿〉校注》。这是孙先生所著《曲录新编》的一种。该书以明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为底本，用其他版本参校，所得异文一一作出校记，改正错讹十分精审，并有具体考证。笔者所见的《〈录鬼簿〉校注》已是清稿本，朱墨灿然，字迹工整，是一部工力深湛的古籍校勘著作。

作为老一辈学者，孙楷第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风严谨，作风正派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问世

在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之际，《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也于1987年10月出版。这本《同人文选》汇集了北京图书馆七十五年来先后在该馆工作的“同人”在工作期间撰写的学术论文代表作七十余篇。《同人文选》的编辑出版，是北京图书馆回顾往昔，规划未来，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国家图书馆的重要项目之一。

《同人文选》的问世，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出图书馆学术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但它给人以启迪，可以使人对图书馆工作增强信心。人们可以从这些文选中，感触到图书馆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潜力。例如，张申府的文章，扩展了人们对哲学文献利用的视野；李耀南的文章，以扎实而又简要的史实叙述见长；钱存训的文章，对图书馆学术研究功能的论述，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从《同人文选》可以看出，北京图书馆不同时期的同人，不仅继承了我国自古以来对图书的收藏管理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的优良传统，而且时有发明。它使我们认识到，在向现代化发展的征途中，图书馆工作不应仅限于图书的借阅、流通方面，而应切实地发挥高效率的文献信息中心与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机构的作用。前人之功诚可借鉴欤？

• 林 敏 •